

【经济学学术前沿书系】

EXPLORING THE CONTEMPORARY
OPTIMAL DEVELOPMENT PATTERN
GREAT CHANGE OF CHINA'S ECONOMY

探寻当代 最优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大变革

郭万超◎著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走向持续增长之路而享有富裕和繁荣，

而有的国家却陷于贫困的泥沼难以自拔？

中国经济起飞的真正秘密是什么？

我们时代的最优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

在这里您能看到独树一帜的答案……



经济日报出版社

【经济学学术前沿书系】

探寻当代 最优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大变革

郭万超◎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寻当代最优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大变革 / 郭万超
著. —4 版.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2. 8
ISBN 978 - 7 - 80257 - 447 - 2

I. ①寻… II. ①郭…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发展模
式 - 研究 IV. ①F120.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9330 号

探寻当代最优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大变革

作 者	郭万超
责任编辑	赵润庭
责任校对	丁 姝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 (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010 - 63584556 (编辑部) 63538621 (发行部)
网 址	www. edpbook. com. cn
E - mail	jjrb58@ sina.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16 开
印 张	15.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7 - 447 - 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序 言

大历史大视野下的中国道路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郭万超博士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做学术访问，让我为他的论述中国发展道路的新书作序。因为我自己也一直关注着这一问题，所以欣然答应。

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无疑是世界性的大事件。从中国的大历史看，30年这个数字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这30年所发生的巨大社会经济变迁却对中华民族复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就是说这30年为历史长河注入了前所未有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因素。

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中国在进入近代之前，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最主要的特点。到了近代，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发生工业和商业革命，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失去了优势，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促使中国仁人志士奋起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一直处于艰难的探索之中。改革开放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尽管也有些制度创新，在一些时间段里也取得过不小的发展成就，但总体上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和贫穷社会主义，仍然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前30年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前提，而且其“试错”式的发展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历史，也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因此，中国道路的探索应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

经验发展告诉我们，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而是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以往对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价值，并在利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始新的独立探索。这方面中

国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截然不同，它们抛弃了共产党领导之后，激进的引进西方发展模式。在中国，现实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中国的政治组织，这个政党深深立足于中国的土地，经过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具有了很强大的学习与适应能力，能够深刻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所以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石。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讨论中国道路，除了中国的视角，还要有国际发展的维度。实际上，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很低调，但在海外，对这个模式的讨论有增无减。从总体上看，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很多后发展国家，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是否能够成为它们成功模仿的对象。因为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获得多大成功，甚至一些采用“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陷入了更大的发展困局。其实，任何成功的发展模式都不可能照抄照搬，对于欧美模式更是不能直接移植。欧美模式是西方国家经过一二百年的演化才形成的，后发国家与它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环境、资源禀赋，所以机械搬运肯定不会成功。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不能照搬，而是可以学习其中的做法，或者给本国的探索一些启示。不过，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处于大致相同的国际环境，具有相似的境遇，会比西方模式更有借鉴性。

如果说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道路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上面所说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极大兴趣，还在于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士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

实际上，中国道路是人类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表现，她不是对西方的刻意挑战，也不是威胁。现代经济增长才出现二百多年，而且只在很小的范围展开，世界上不可能只有欧美一种发展模式，各国在发展道路和模式上也不可能是统一的。即便文化上同根同源的欧美国家，其发展模式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中国道路是在与欧美异质的文化圈发展起来的，她不仅具有现代发展的共性，还有自己的个性。但这种个性构不成对西方的威胁，西方对此显得过于政治化。

西方文明是一种竞争性文明，因而西方国家非常容易以自己的这种文化价值观看待中国。西方文明自希腊、罗马时代的独立城邦，到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封建诸侯，直至近代的民族国家，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实力竞争构成了西方世界体系的基本模式。“力量所及，则尽力扩张”，国家“以实力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国家战略的核心是在相互冲突的国际环境中如何使用国家权力以实现国家目标和

扩张国家利益。

而从历史传统上看，中国基本是一个战略内向型国家，国家命运的焦点是天下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即所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突出的天下情怀与鲜明的道德意识构成了中国战略文化的核心特征。二千年前即有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到21世纪，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即使将来中国强大起来了，也决不称霸”。

因此，西方应该抛弃冷战思维，以一种新的包容性的心态接纳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思维方式。

中国道路的兴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不过，尽管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对中国道路和模式的兴趣已经很浓，但还没有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郭万超博士的这本著作能够把中国道路放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融合了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理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验进行了理论升华，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新观点。因此，该书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新开拓，是对中国道路研究的新深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该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

2012年8月

自序

我们时代的新经济发展观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肇始于18世纪初的西欧，以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为标志。目前，世界上发展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和地区）共有44个，仅占有所有国家与地区总数的约18.5%，它们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二战前，发展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大都属于西方文化圈（只有日本例外）。二战后，发达国家和地区加进了亚洲四小龙，西方中心主义开始受到冲击。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作为东方文化圈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开始起飞，越南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也渐有起色。不幸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在探索发展的道路上苦苦挣扎。

以上事实表明，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并不算长，其实践展开还很不充分。东亚与中国的经济奇迹证明，欧美中心论的神话可以打破，资本主义的眼界可以超越。人类必须而且能够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疆域，也会创造新的更好的发展路径。而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则是我们这个以发展为主题时代的迫切需要。本书的目的就是在深刻反思、系统检视现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以正在兴起的中国道路为主要样本，力图提出一个更加科学的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基础框架。当然，经济发展并不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本书也不可能包括经济发展理论的所有方面。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而每个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代表作，在该书序言中，阿瑟·刘易斯指出：“研究土地使用权的理论，与研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论并无多少共同点”。经济发展理论包括了众多的论域，而本书只是试图为经济发展研究提供一个有关的基础。

在上升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古典经济学家大都在不同程度上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思想。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成熟后，那时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就不再象以前那样关心经济增长了，而是着重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最有效地配置于各种用途上去这一问题。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使新古典经济学编织的市场经济神话彻底破灭，西方经济学家开始重新重视宏观经济问题。特别是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形成了经济发展研究的热潮。当然，

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对发展的关切点是不同的。

综观现有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适应发达经济需要而形成的西方增长理论。二是针对后发国家的所谓发展经济学。三是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概括出来的指导转型国家和后发国家的理论原则，主要是“华盛顿共识”，这种共识实际上是一种急就章似地的理论改造和简单搬运（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理论，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不同分支都是对经济发展不同角度的探究，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学其他门类有时很难分开，但企图对反映成熟市场经济的西方理论进行机械改造，用于指导没有市场经济实践的转型国家和后发国家，是一种倒果为因的做法，也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四是从前苏联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学说。

以上四种理论从大的分野看，前三种属于一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理论，其思想渊源来自亚当·斯密；第四种属于第二类，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其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

前三种理论又有些区别。第一种和第三种理论是“纯西方”的。这两种理论的根本缺陷是缺乏历史的维度和对社会整体性的关注。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是一个极其简单化的抽象的经济人，根本找不到真实的人及其历史活动，其对经济的分析是解构式的，似乎经济与政治、文化等领域毫无关系，因此，它们与现实经济世界严重脱节。当然，西方经济学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许多共性，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且，仅仅从工具主义角度看，其研究方法也有其合理之处。第二种理论是针对后发国家的各种现实问题，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杂糅式运用。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十分有见地的思想，但从整体上看，发展经济学难以形成自己的逻辑与理论体系。实际上，发展经济学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走向了衰落。

第四种是个“另类”。马克思主义发展学说在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比西方经济学更科学、更先进的。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是最大尺度的历史发展，目的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其对象是人类社会基本社会形态。这种基本规律发挥作用的历史期限是很漫长的。虽然他们在揭示这种规律时，也涉及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具体发展问题，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是以批判的视角展开的，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是提出了某些基本原则，不可能也不会提供现成的答案。更令人预想不到的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的。然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大都没有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反而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理论原则指导历史发展的特殊现象具体过程。因此，都不同程度上犯了本本主义的错误，推行的经济体制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显然与人类经济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不符。上世纪90年代

开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有些国家根据本国实际创造了各具国家和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显示出新的活力和优势，使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获得了新生。

显然，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理做了缜密细致的研究。但这种理论受到资本主义的严重制约，其基础理论与方法论存在明显缺陷。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学说更具科学性，但缺乏未来社会具体形态下的发展理论，特别是在存在商品、货币的条件下如何发展的各种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然而，就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言，马克思主义发展学说与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存在着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完全对立的。从我们时代的现实条件看，最好的发展理论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学说与西方发展理论的综合，在发展的理念上加上社会主义，在新古典分析中加进“历史逻辑”和唯物辩证法，在解构式分析基础上加进整体性分析。这样的发展理论可以避免研究方法的偏狭，也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带来的种种危机。

这种综合也许与两个方面学者的思维定势与学术情感不容，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就与具体实践的关系而言，有用的理论是最好的。我们判断一个理论好坏，不是看它是否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意，而是看它是否符合当下阶段的现实需要，同时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不能是遥不可及的。因此，适应时代和各自国家需要的理论是最好的。

完成这种理论综合与创新非个别人和个别著作所能及，本书主要发展了被西方经济学忽视的领域，特别是深刻揭示了新兴的中国道路初步展现的内生特质及其动力机制，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根据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和趋势，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分析理路。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经过自我调整，虽然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但其内在缺陷一直无法克服。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代表着一种新的文明取向，具有其他发展模式所没有的内在特质，这是她将成为我们时代最优发展模式的根本优势。任何道路的根本目的和功能是寻求发展阻力最小化、动力最大化，而只有从内生特质上才能科学揭示其动力生成机制。中国道路的内在特质主要表现在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也为经济发展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生长点。

第一大特质是，它真正坚持了以人为本，实现了发展动力源的最优化，从这一条看，新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学）首先应该重新找回人，人应当成为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作为劳动者的人也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人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人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我们看到，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大量存在的是无效劳动，或低效劳动。而劳动生产率的改进本质上是通过提高人的经济潜能实现的。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人只是被动的、消极的因素，仅被看作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反映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其经济人假设把人排除出经济发展之外，用物的所谓最优配置代替了对人的能动性的关注。实际上，是人支配物，不是物支配人。被西方经济人假设丢弃的人在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这些学科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最高也就达到5%，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增长为10%，根本原因何在？西方经济学为了追求确定性，以抽象的经济人假设抹杀了人的创造性与复杂性，忽视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根本作用，割裂了人与物的关系，因而，不能解开经济发展之谜。

在西方经济学中，只有极少数人关注人的问题，比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里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熊彼特虽然把企业家（资本家）看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承认企业家具有与物不同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却把广大劳动者等同于物，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就如同机器的价格一样，只应由市场供求决定，企业利润应由企业所有者独占，工人如同机器一样，无权分享企业利润。“企业家所需要的一切商品，从他的观点看来都处于同等地位。他需要自然力、人力、机器、原材料，所有这些都同等重要，具有同等意义，无法区别这些需要中何者更为重要。”

经济人假设暗含了资本主义是永恒合理的制度，适应了它的需要，但其缺陷显而易见，更不符合社会主义和东方文化价值观。西方经济学对人的认识的狭隘性严重窒息了经济学的发展和功能。尽管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涉及到了人的更多要素，但由于回避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观点与认识方法，还是无法解答经济发展之谜。只有突破对人的认识，在经济学重新找回人，才能使经济理论和西方发展模式走出困境。但这是资本主义的死穴，它自身无法完全突破。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确立关于人的科学观点；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成为自己发展的主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深刻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恩格斯从人的意志考察了历史发展总合力，他这些写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恩格斯主要是根据历史经验对阶级社会人在历史发展中的情形的论述，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尊重，人推动发展的行为从自发转变为自觉，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可以实现人的意志合力最大化。

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并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找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中国道路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使人民成为了发展的主人，把全体人民的一切潜能都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发展上来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中，人不仅仅是经济要素，更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是创造自己幸福的主人；不仅仅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对经济发展有贡献，还包括其他一切领域的人；不仅仅是原子化的孤立的只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体，而是具有共同利益的整体——人民。这种对人的理解完全超出了西方的眼界，世界上除了中国好像没哪个国家能做到，这除了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基因看得益于中国的人本思想与集群主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国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国道路的首要优势。

第二大特质是，它保证了社会有机体的协调一致，实现了社会整体合力最大化。从中国的这一条经验看，经济发展理论应该注重整体性研究，探求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机理。

人是发展的本源，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元要素，也是发展的元要素。人也是社会的人，在人及其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诸多派生要素，如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人的意志总合力是人的各种派生要素，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动力系统，在社会有机体中相互作用融合的最终结果。达成人的意志总合力最大化，除了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方针，还需要在正确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对社会有机体的各种要素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实现社会有机体合力最大化（理论上最大）。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主流社会思潮和运行的基础，建立在其上的发展模式的一大弊端是割裂了社会有机体各部分的内在联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形不成整体发展的合力。这也反映在西方经济发展理论中，这种理论以“解构”的方式把经济增长看作某些因素的变量。虽然解构能使研究者看到事物的每个构成，但是，如果孤立地观察、理解每个“构成”，势必不能从整体上了解这些“构成要素”的真正的功能性作用。正如沃勒斯坦所说，社会科学的研究

究必须同时是历史性和体系性的。

西方个人主义社会形成的是一种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个人自由决策与市场自发调节被认为可以实现经济发展整体效益最大化。在这种社会，任何对人与人关系的自觉调节、对社会整体的引导都是多余的，政府的角色也就是守夜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的亘古法则，政府主导、整体主义无法被西方理解。

欧美先发国家之后的新兴经济体对发展模式进行了创新，形成了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的东亚集群主义资本主义模式，而中国在扬弃以上模式的前提下创造出了集群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道路以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为指导，避免了之前那些模式的弊端，最大可能地减少了发展成本，实现了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发展合力最大化。

不同发展道路下社会有机体的组合和联系方式不同，产生的发展效果也不一样。中国为发展所进行的整合与动员方式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是一种自觉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方式，同时也是吸取了之前各种发展模式的长处的综合方式。它的优点在于很好地把握了个人活力与集体理性、社会理性的均衡点。这种整合方式最大可能地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到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上来了。集中精力做最重要的事情，或者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这是中国道路的另一个重要特质。

中国经验提醒我们，必须注重社会整体中经济之外的因素对发展的意义。比如，对于后发国家，政治因素有时比经济本身更重要。W. W. 罗斯托在研究了各国的经济起飞历史后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更一般的情况下，起飞的到来不仅要等到社会基础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农业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要等到一个准备把经济现代化作为严肃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业的政治集团的出现”。

文化的鸿沟造成的发展模式差异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本文开头指出了不同文化圈的发展差异，实际上，文化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点。这个方面书中有比较全面深入的阐述，这里再做一强调。对文化最宽泛的界定是，非自然的领域就是文化的领域，也就是说凡经过人改造的东西就具有了文化的特征。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包含四个方面：一是物质设备，如器物、房屋、船只、武器等。二是精神方面，包括种种知识，以及道德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价值体系，社会组织的方式和语言。而“标准化的、身体上的习惯或习俗，亦即机体上较巩固的修正”（马凌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是精神文化最基本的要素。马氏又将语言和社会组织分离出来进行讨论。三是语言，它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

文化的一部分。四是社会组织，它是物质设备与人体习惯的混合复体，是集团行动的标准规矩。它靠外在的规则、法律、习惯等手段进行维系，这些手段的内在根据则是个体的良心、情操等道德动机。文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体，其中最重要的是精神文化。

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与源泉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而文化的作用体现在对人的塑造与影响上，人之所以是人，在于他是一定文化中的人。马氏把制度作为了文化的一部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文化的作用根本在于它决定了人们行动的动机、欲望、方式、态度等。这些因素又形成了经济活动的不同的动力机制、制度特色、政治模式、家庭观念、消费习惯等等。文化对人的影响常常是以群体的形式表现的，它是集体行动逻辑的基底。擅长进行抽象模型构建与经济计量的现代经济学家，完全忽视了不同文化下人性的复杂，而人性的特质是形成不同经济行为模式以及造成不同经济绩效的深层因素。经济活动看起来是商品生产与服务活动，实际上，现实的具体的经济活动就是人的活动，比如，现代企业管理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他们的工作动力、协调性、态度等都反映了文化的力量，全赖于一个社会文化的特质及企业文化的养成。文化虽然也是变化中的，但非常缓慢，而且有其基因。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文化的差异在减小，虽然已不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文化差异不可能消除。尽管有人号称世界是平的，但文化的沟壑却不能填平，真正能理解和融入异质文化的人太少了。

第三大特质及动力机制：它实现了制度的顺利成长，保证了发展动力激励机制的高效性，中国的制度成长显示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同时鲜明反映了制度成长的三大原理。

由人衍生出来的派生要素基本可以用制度这个概念概括，社会有机体也可以理解为是人的活动与制度的结合体。所以实现社会有机体发展合力最大化最重要的就是创建有效率的制度。制度是社会有机体的规则（或信念）系统，是它运行的社会基础，它“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的变迁的关键”。

中国道路的核心就在于有效地实现了制度成长。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制度变迁概念有些含混不清，苏联的转型也是制度变迁，东亚四小龙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也经历了制度变迁，这两种变迁是不一样的，一种意味着衰退，一种意味着成长。这里引入制度成长或制度发展概念，用来指有效的制度变迁。

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形成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这种制度必须是自主内生的。中国道路的成长历程，以宏阔而细腻的发

展轨迹生动地显现了现代制度成长与创新的机理，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内部自身因素主导生成的，不是外部移植的。

在世界现代化大潮冲击下，中国主动地进行了适应性制度变革，但这种变革是立足中国国情，以自我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为主导的。从改革的指导思想看，马克思主义虽源于西方，却是被中国化的。从其领导力量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一位外国记者问毛泽东：你自己究竟首先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人？毛泽东的回答是：你这个问题等于问我，是先有父母还是先有儿子？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制度转型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自生的独特思维和文化：一是既不搞完全看不见的手，也不搞完全看得见的手，而是搞有纪律的手；二是强调宏观经济稳定，不是一下子放开，但也不是完全不放；三是既不完全的开放，一下子开放，也不是不开放，而是注重在什么领域和以什么样的速度开放。这些经验可以用“中庸”两个字概括，这是中国古典智慧的体现。中国走了一条中庸道路，什么都不走极端。此外，带有家族性的民间企业，在改革初期弥补了社会信誉的缺失；家庭作为社会单位，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教育和社会保障功能；东方式节俭使长期高储蓄和高投资成为可能；而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则有力平衡着市场经济初期出现的金钱至上和道德滑坡。

其次，它是在长期发展与改革实践中演进而成的，不是人为快速设计出来的。

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基础，坚持以“摸着石头过河”方式推进是中国改革的鲜明特色。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是第一性的，一切经过试验，这是中国制度顺利成长的根本原因。郭树清指出：“与苏联、东欧国家迄今的实践很不相同，中国的改革走过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从思想理论准备的角度而言，中国政策来得最为突然。除了若干最一般的指导原则，中国将许多问题都留给实践，具体的目标、步骤、方法等都是不断对一系列难题作出选择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中国的改革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渐进、迂回、给基层以极大自由度、力求从局部突破、不断试验、经常反复的道路。”王逸舟也认为：“‘中国道路’具有一种明显的凭着感觉走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理性、计算和繁复的方程式在这里永远不起长期的、支配性的作用，相反，‘先行一步’、大胆实践却具有极高的价值和酬劳。”

中国改革的顺利推进还在于正确处理了发展与改革的关系，把发展实践效果作为改革的指向标。建立市场经济是中国道路的核心内容，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发展实践催生的，是在发展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改革之初中国并没有市场经济的

概念。当时，中国经济严重凋敝，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扭转近乎崩溃的国民经济是首当其冲的任务。“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在当时都是受欢迎的。在强烈的发展动力下，人们逐步认识计划经济的弊端，并提出改革的诉求，进而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随着发展实践的推进，对体制改革提出进一步要求，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一步明晰了改革的方针。因此，中国的政策很明确，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改革的根本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为发展服务的。

制度内生决定于经济体中的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然而，经济体中的这些要素只有通过实践这个根本环节才能形成有效率的制度。中国正是把发展与改革实践作为制度成长的根本手段和途径，并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才顺利实现了制度成长。

最后，中国的制度成长表现为一个自我适应过程，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

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关于制度变迁的唯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掌握的，这就是制度变迁中绝大部分是渐进的。”以发展实践效果为导向使中国的改革多多少少象一个随机行走的过程。这种改革的优势是具有阻力小，易突破，成本较小的优势，因此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事情。制度成长渐进性主要是由三个方面决定的：首先，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成长的重要特征，因此制度成长不是一个激进式简单照搬的过程，而是一个在不同社会有机体中自然演进的适应性渐进过程。其次，制度成长不仅涉及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它要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的严重制约。而文化认知模式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后，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所谓制度就是人类惯例化的行为模式，在很多情况下每个社会成员对其行为是不假思索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因而是习以为常的，而这种行为模式又是长期日常交往所发展的社会行为技巧。当然，这里所说的渐进，只是一个与激进相对的概念，并不是制度成长越慢越好，一般其速度应以实践效果为标准。

应该说，时至今日，经济发展理论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种真知灼见闪现在各位思想家（不单是经济学家，还包括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的著作中。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的时代并不缺乏正确的理论。但为什么经济起飞是那么的艰难？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依然处在贫困的边缘？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推动，好的理论能够正确揭示客观规律，反映时代前进的方向，但理论只是改变世界的力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经济发展存在基本的理论法则，但由于各自国情和国际环境的不同，这些理论原则的运用会各不相同。理论是发展的必要条

件，渴求发展的国家离不开正确的理论，但它并非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好的理论与政策的运用推行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领导集团的觉悟与利益，以及一个国家的初始条件约束，面对现实的复杂利益冲突与斗争，面对积重难返的制度缺陷与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即便再好的理论有时也是无奈的。一个国家、一个政治集团或国家领导者是否愿意接受好的理论，是否愿意推行正确的政策，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国际的、国内的、政治的、文化的，个人认识与性格的等等。经济发展作为人们的美好愿望，有时并不是当政者的必然追求，有时是明知可为而不为。经济发展相对政治集团的利益只能是第二位的，理论与政策选择取决于背后的政治博弈。曼昆从2003年至2005年离开了大学讲台，成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总结自己在白宫生活时他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的建议仅仅是一个复杂过程中的一种要素。

中国北宋时期文学家苏轼有一句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颇具哲理意蕴。学者们站在不同角度，看到的经济现象或事实会不同，但不能否认他们各有其认识价值，当然，在这些角度中也许总一个是最佳的，或者更聪明的人会从不同角度审视，而后再做判断。笔者就是希望做这样的聪明人，但还是担心自己的智慧不够。另一方面，由于每个人依循不同理论传承等原因而形成的固有心智模式的差异，特别是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表达工具所具有的局限性，造成了种种理论歧义与纷争。笔者认识到这些，在论及每种理论时，很少一棍子打死，而是看到其各自的合理性。